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

——《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杨亿力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述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关键词] 张扬;《第二次握手》;革命至上;民族本位;叙述逻辑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85-06

Revolution First and National Standard

——On the Narrative Logic in the *Second Handshake*

YANG Yil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Love and science are two themes in Zhang Yang's *the Second Handshake*. The two themes construct itself with two kinds of narrative logic: revolution first and national standard. These two kinds of narrative logic have a logical structure of binary opposition. As the opposite of Old Society, “revolution first” stitches “revolution and love”, “revolution and science” and “revolution and intellectual” together. With negative impress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novel tries to prove the wisdom and just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volution first” and “national standard” are a pair of isomorphic concept. In the novel, they construct each other and finish the circular argument of revolution, nationality and science.

Key words: Zhang Yang; *the Second Handshake*; revolution first; national standard; narrative logic

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是“文革”期间流行的手抄本小说的代表作。在以8部样板戏为主导的文学年代,这部小说一度被列为禁书。1979年,张扬平反,《第二次握手》得以公开出版,并在社会和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般认为,《第二次握手》在版本上大致可分为“1974抄本”“1979定稿本”以及“2006重写本”。^[1]就目前流传情况而言,后两者较为常见。虽然版本多样,但小说的主题并没有变化。“1979定稿本”的扉页分别引用了马克思论科学、恩格斯论爱情的格言。“2006重写本”

尽管省去了马克思的格言,但在序言中依然声称自己是一部“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2]的作品。“爱情”和“科学”一直是文本的两个主题,它们直接突破了当时的思想禁区,是《第二次握手》被称为“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3]的重要依据。

我们认为,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所谓的“革命”指的是参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推翻旧社会、

收稿日期: 2013-07-29

作者简介: 杨亿力(1986-),男,福建福州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建设新社会的活动;而“革命至上”则指自觉追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不与旧社会“合作”的意识。本文的“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民族本位”则指在与“他族”的对比中突出本民族的精神和智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不仅是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者潜意识的直接流露。

近年来,学者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如邓谦林的《〈第二次握手〉的历史书写方式》一文,引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视角,对《第二次握手》中的革命、民族观念进行阐发,言之成理。但文章并未应用相关视角对其中的科学主题进行探讨,也不曾对文本中相关现象的内部逻辑因素进行观照,因此这一话题尚有可言说之处。

一 “革命至上”主导下的爱情、科学与知识分子

“革命至上”以“旧社会”为对立面,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了一起。

爱情与政治相结合,在革命叙事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在《第二次握手》中,这个问题突出体现在苏冠兰与叶玉菡之间的感情纠葛上。叶玉菡对苏冠兰抱有极深的爱意,而苏冠兰则一直与叶玉菡保持距离。苏冠兰此举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内心深爱着丁洁琼;二是认为二人的婚姻是旧社会“父母之命”的产物,而苏又非常厌恶旧社会的这种习俗;三是他对叶玉菡本人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认真考虑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歡叶玉菡,现在找出了根本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我总想投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去,而她却太温顺、沉寂、缺乏个性和反抗精神。在叛逆的道路上,她不能和我共同奋战。父亲和查路德正是看中了她这一点,才把她当作一副枷锁来束缚我,才拿出这张王牌来破坏我的自由、我的选择,破坏你我之间的爱情。而在这个问题上,你与她恰好相反,这正是我们爱情的基础。现在有些人在高唱“爱情至上”,我倒是感到,爱情从来不能至上,真正“至上”的是政治观念、政治利益……^{[4]131-132}

没有个性、没有反抗精神、不能一起叛逆,是苏拒绝叶的根本原因。苏冠兰认为反抗精神和革命至上是他与丁洁琼相爱的感情基础,他还认为爱情必须让位于政治。在苏冠兰心中,爱情已经自觉与时代、政治相结合了。

苏冠兰对叶玉菡的态度的转变,是从鲁宁的劝说开始的。在亲眼目睹叶玉菡舍身保卫国家机密、为救自己与特务英勇搏斗的行为之后,苏冠兰内心

的隔阂逐渐消融。这种变化也来源于苏冠兰心中的“革命标准”:叶玉菡并不是旧社会、旧习俗的服从者,她也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在劝说过程中,鲁宁还批评了苏的世界观:

你信服“科学救国论”,但你终于又看到科学并不能就中国,你大概还崇尚过“爱情至上主义”,但有始终无法获得美满的爱情,反而受尽了它的磨难……总之,几十年来,你就生活在矛盾、苦闷之中,晃晃荡荡,沉沉浮浮,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你也许埋怨命运对你太不公道的吧?其实,哪里是什么命运的主宰?起主宰作用的,还是你的世界观啊!……^{[4]304}

鲁宁指出:苏冠兰对丁洁琼“爱情至上主义”式的守候是没有结果的。除了“旧社会”的阻挠外,最根本的因素是“世界观”的问题:苏没有将自己的爱情主动与革命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即爱情服从政治。所以鲁宁要求:

从现在起,你应当换一副精神面貌,让爱情服从政治,把个人问题归入革命事业的总渠道。站在这个立场上,正确处理周围的一切。首先,你必须把玉菡当作一位好同志,要在生活上、工作上尽可能地关心她、爱护她,不允许再以任何方式加深她心灵上的创伤。我希望看到你们共同的美好未来;在最近即将开始的PG-501实验中,你们将一同工作;在这段工作中,你应当做到革命利益和你的良心要求你做的一切。^{[4]304-305}

可以说,“苏叶”与“苏丁”是文本提供给读者的两种爱情模式,小说最终选择了前者。因为这种结合更符合当时的革命利益,更能体现“革命至上”的逻辑。鲁宁则是这种逻辑的传声筒,他实际在暗示:“爱情服从革命”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人们只有自觉将自己与革命相结合,主动反抗“旧社会”,才能获得幸福。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演,“旧社会”被论证为苏冠兰坎坷爱情的“罪魁祸首”。

“革命至上”还着力突出“革命”是科技发展的前提性因素。小说认为,旧社会的一切是不会容许中国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凌云竹曾对苏冠兰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试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军阀、政客、贪官、土匪,会让中国顺顺当地地发展科学技术吗?要说从事科学和教育,我大概是有点发言权的,可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能干出什么来?^{[4]55}

苏冠兰试图从莴苣的茎液中提炼结晶体,并将其制成“全世界截至目前为止唯一对人体神经机能没有任何刺激和损害的药物”。但这种“世界之

最”不容于当时的科研体系:

可是,他的实验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没有适用的灵长目实验动物,没有高水平的助手,特别是没有病理学、生物化学方面的人才,没有像样的参考资料……什么也没有么?有的!有几位权威的讽刺,那是川慈医学院几个喝过“洋水”的“名教授”的指手画脚:“哈哈!连中国大门坎也没出过一步的土包子,居然打算钻冷门,一举成名啦!”“嘻嘻!莴苣——这是什么?是蔬菜嘛!蔬菜能当安眠药,猪肉一定能作长生不老的灵丹罗!”“嘿嘿!安眠药吃多了可能致死。鄙人眼下正在追求马公馆的二小姐,倘若失恋,倒要请教苏先生,吃多少莴苣才能自杀?啊哈哈!”^{[4]225}

“旧社会”的法律体系也不容许科学家们进行具有开拓性的研究:

有一次,他(苏冠兰)制订了一个对重要进行分析和提取有效成分的计划,并带领几个助手开始进行实验。不料,教务长气急败坏地跑来通知他,说是触犯了民国十七年和二十二年南京政府颁布和补充的所谓“取缔旧医法令”,有人可能会提出诉讼,一旦事发就难办了,等等。^{[4]226}

民国政府的确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医法令:1923年,颁布了取缔中医的施行细则;1925年,将中医逐出高校学术体系;1928年北伐后又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些是小说中所构思的“取缔旧医法令”的社会历史依据。其实,“取缔旧医”本是一桩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思潮下产生的学术公案和社会事件。小说依据“革命至上”的逻辑,对史事略作修改,将其塑造成科学发展的阻碍之一。

但是,“新社会”可以促使苏冠兰的科研事业突飞猛进。

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苏冠兰在政治上、学术上不断提高,他历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委员、北京市药学会理事。解放十年来,他先后撰写、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出版了三部药理学、分析化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他和另外两位科学工作者合著的一部关于能抗某种病毒的药理学专著,引起了医学界的极大重视,为此科学院还颁发了奖金,他并被任命为第一医科大学实验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解放以来,他经常到各地视察、讲学、交流学术经验。此外,他还多次出国访问。^{[4]330}

“新社会”不仅为苏冠兰解决了诸多难题,还授予他诸多头衔以示认可。他和叶玉菡“把一切化作

动力,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艰苦、高深的科学研究,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他们用兢兢业业工作的实际行动,抒发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激和对共产主义光辉远景的崇高信仰”。“旧社会”是苏冠兰情感纠葛、中国科学落后的终极因素。小说在叙述故事发展的过程中,无时不在突出这一点。

小说也在积极寻找知识分子合法存在的理论依据。这主要借助鲁宁和周恩来两位人物来言说。鲁宁反对轻视、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紧急警报”一节中,鲁宁不仅严厉驳斥了“老同知识分子混在一起”的言论,还从革命史观的宏观视角,论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美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几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我个人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这一点。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几度存在的轻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倾向和现象,才是真正错误的。^{[4]307-308}

鲁宁将知识分子视为必须团结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这与苏冠兰、叶玉菡、凌云竹夫妇等先进知识分子同情、资助革命的叙述互为映照。

小说中还多次提到“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周总理”亲自出面挽留丁洁琼一事,即为一种体现。如果说“鲁宁”的观点是基于革命的阶级史观,那么“周总理”则更进一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经验出发,阐述人才的重要性: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爱护人民群众,善于发现、保护和培养人才。有时,一个杰出的人才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数优秀人才,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地爱护、珍惜,让他们象群星一样发热发光……”总理倚在海棠树干上,沉思地说:“可是,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历代反动统治者在打击杀害人民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摧残、毁灭、埋没了千千万万有才能的人,大大推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小张,你说我们能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吗?”^{[4]369}

借“总理”之口,小说肯定了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其中那种“不让历史重演”的愿望溢于言表。

“革命至上”的叙述逻辑将人物的爱情、科学事业的兴衰、知识分子的定位缝合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对立面——“旧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将“旧社会”视为罪恶的综合体、阻碍

中国进步的主要原因。如借凌云竹之口说道：“今天的中国，只要稍微有点爱国心，正义感就会被加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轻则摔破饭碗，重则丢了脑袋。”就连一度被小说塑造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苏凤麟也不能幸免：“在蒋介石统治下，他对国家、对民族稍有益处的想法都将化为泡影”。“旧社会”的罪恶性正是革命逻辑存在的前提。这为小说中的人物挾伐“旧社会”、坚决不与之合作、期待新社会提供了依据。也由此，“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得到了极好的揭示。

二 “民族本位”立场中的“外国”、心态与“自我证明”

“民族本位”的观念也是构建文本的重要逻辑之一。与“革命至上”相同，“民族本位”也需要一种对立面——“外国负面印象”。通过一系列“外国”负面印象的映衬，小说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以及中国发展科技所具备的独特正义性。

小说中的“外国印象”几乎全为负面。邓谦林指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第二次握手》中主要体现为盲目排外、自恋狂妄两个方面。^[5]但邓文将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来源归结于政治上的“无意识”。我们认为这还来源于叙述者内心深处的“受害者”心态。

这种负面性突出体现在外国势力对中国的破坏、外国社会自身的混乱与邪恶两个方面。

教会学校和教会人员是小说前半部分外国势力的代表。他们一方面与“旧社会”相互勾结，维护其“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是本国拓展在华利益的急先锋。查路德和他的渤海大学即为一例。查路德替苏凤麟监视、控制着苏冠兰，不容他有半点自由。作为回报，苏凤麟保住了查路德校长的职位并将香山天文台的相关权利暗中移交给查背后的美国。即使回到美国成为政府高官之后，查路德也不忘对中国科学家进行迫害。小说中查路德治下的渤海大学死气沉沉，犹如一座监狱，它泯灭了学生的个性，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病夫”：

学校有一圈围墙，围墙内耸立着一幢幢旧的发黑的用红砖和花岗岩砌成的教堂、校舍，禁锢着一群被严格的校规、教条和繁重的课业折磨得面色苍白、死气沉沉的学生，走动着一个个西装革履、板着面孔的教授和导师，游弋着一些幽灵似的神甫和修女……这难道是一所大学吗？不！不！这简直象但丁和维吉尔所经历过的地狱！……美国人声称他们要在渤大培养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来，事实上，他们在这所牢笼中专门制造的，是一个又一个

的病夫——肉体和精神上的病夫！^{[4]130-132)}

“卜罗米”则是长期潜伏在中国的阴险特务。他亲口承认：“我在中国几十年来所穿的神甫的黑袍，不过是一个掩护。我的真实背景，既是梵蒂冈，又是中央情报局……”外国势力险恶还表现在它们还不忘抓住机会，歪曲报道苏凤麟的死讯、诋毁新中国等等。

“外国的罪恶”源于外国社会自身的混乱。小说展示了一幅美国社会的图景：

这个国家固然比我们的祖国富裕得多，但也畸形、野蛮、粗暴得多。在繁华兴旺、灯红酒绿的外壳下，到处是贫民窟、穷人、乞丐、三K党、酗酒、凶杀、裸体舞、抢劫、离婚、奸骗、自戕和种族歧视……^{[4]228}

小说把美国塑造成了一个富有的野蛮之国，意欲反衬祖国的文明与和谐。这种对比化解了由于“贫困”而带来的自卑，并找到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小说还设置了外国友人对中国人“忏悔”的情节。试看奥姆对丁洁琼所说的话：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古代中国学者和工匠作出过许多光辉贡献，这些贡献在人类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上刻下了伟大的足迹；至于中国人在文学、哲学、艺术上为人类文明史增添的财富，就更是不可估量的。近百余年的落后，一方面是上层集团的腐朽造成的，另一方面，老实说，要归咎于我们那些挂着文明招牌的白人同胞对你们的侵略——豺狼般的烧杀、掠夺……

……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在东方民族的尸骨堆上，建立了西方今日的文明。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

……我愿意代表我的民族尽到报偿的义务，弥补我们的仙人造成的过失；我愿意看到东方的兴起，看到中华民族的兴起，并且在这种合乎历史规律的大变动中竭尽自己的最大力量……^{[4]210-211}

这种叙述实际上是对西方近现代史的一种宣判：西方的物质财富来源的一种途径——对东方的抢掠。因此，西方必须担负中国落后的历史责任、认清并接受中国兴起的必然趋势。

“外国负面印象”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受害者意识：“外国”对中国犯下的无数罪行，是中国百年苦难的根源之一。在中弱外强的实际比较中，这种受害者意识又表现出了一种保守的弱者心态：对来源于外国社会和现代文明也抱有极高的警惕、质疑与潜意识的抗拒。“民族本位”并不满足于控诉。它更强调证明自己的存在合理性与优越性，以形成一种心理平衡。对本民族智慧和道德优越感的论证

成为实现平衡的重要砝码。

在丁洁琼出国之前,凌云竹叮嘱她“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要赶上他们。超过他们”,要“让那些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人和敌视中国人民的洋鬼子,在你身上看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文本中所蕴含的那种奋起直追的欲望和证明自己的决心溢于言表:中国人不会比任何人差,中国人同样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技。

这种欲望突出体现在苏凤麟和丁洁琼两代科学家身上。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顶级的科学家,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如苏凤麟:

南京城陷落前几天,苏凤麟就到了香港,然后取道新加坡、加尔各答、开罗、罗马、巴黎,到了伦敦。沿途他收到联合王国驻外使领馆官员彬彬有礼的迎送。当他乘坐的飞机在伦敦机场降落时,收到一大批来自皇家学会、各大学和天文台的头面人物的非常温雅的欢迎。老院士的尊贵不减当年,他又回到了圣·安勃罗斯学院,仍然领受优厚的薪金,过着闲适的日子,偶尔也去格林威治天文台或剑桥观象台指手画脚一番。^{[4]203}

对苏凤麟的描述是小说渴望获得他族民族尊重的一种体现。小说在丁洁琼身上也设置了一个情节:

人们谈论到本届讨论会的名人时兴趣盎然,如数家珍。这些名人中有几位公认的科学大师和几十位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

“密斯丁!”奥姆霍斯望望身边的女同事,关切地问:“你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吭声?”

“因为没有谈起一个中国人!”丁洁琼偏过脸去,瞧着机舱外飞驰的云絮。^{[4]209}

按丁洁琼的说法,似乎中国人不应该缺席人们关于科学家的任何谈论,这种近似乎矫情的敏感心态是“民族本位”自尊心的典型反映。小说将丁洁琼塑造成中国人智慧的突出代表,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发现了“席里构造”所存在的问题,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勇敢地指出来。小说似乎更在意外国人对中国科学以及中国科学家的肯定:

席里大师兴奋地喊道:“我很早就从丁女士的创见中发现了天才的闪光(略)我敢说,很可能在富兰克林宫开始了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东方人的时代!来吧,登上这座为世界一流科学家专设的讲坛吧!谈谈你的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乃至全部,谈谈你在尖端科学的最重要领域内的卓越创见,谈谈未来的东方,未来的世界!”

会场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丁洁琼昂起面庞,拉紧肩上的纱巾,迎着无数的笑脸,沿着过道徐徐前行,不断地朝欢呼的人们微笑、颌首致意。^{[4]220-221}

小说不仅让外国科学家们热情呼唤丁洁琼登上“世界一流科学家专设的讲坛”,还大声疾呼“东方人时代”的来临。仿佛全场的聚光灯全打在了丁洁琼一个人身上,这场学术会议成了丁洁琼一个人的舞台,或者说中国人的舞台。一举成名的丁洁琼不久就参与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这一情节受到了不少读者的质疑:一个外国人,如何能参与当时美国最机密的科研项目?“2006年重写本”在《后记》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公开回应:

我把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著《美国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一位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应为‘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参加过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材料寄给山义郎(略)即一九六三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就在获悉《第二次握手》原始素材的同时,通过非常特殊的渠道得知一位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当年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事实——而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丁洁琼”,没有后来被称为“影响过一代人”的《第二次握手》。^{[2]759-760}

《后记》试图用《美国的民族问题》和“特殊的渠道”证明该情节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并不能消除以上质疑。首先,“华裔美国女物理学家”与“留美中国女物理学家”在国籍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而言,外国人是难以参与类似“曼哈顿工程”这样绝密计划的。“特殊的渠道”一说也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和可信性。实际上,无论中国人是否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在小说中已不重要了,就像丁洁琼说的:“人种有黑白棕黄红,其他肤色的人并不比白种人差,并不比美国人差……”小说只是希望证明中国人也具有占据世界科技最前沿的智慧与机遇。这种急于自我证明的迫切欲望虽然基于“民族立场”的叙述逻辑,但潜意识中是一种极度渴望认同的自卑心态。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进程中,中国人不仅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还有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这些使得科学技术在中国人手中具备了独有的正义性。

在小说看来,爱国主义精神是这种正义性的基础,正如凌云竹所说:“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正直的、进步的人,是一位爱国者。”^{[4]172}丁洁琼无时无刻不忘振兴中国科技重任。即使祖国还处在“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之下,她的决心也从未改变:

把学得的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今天,

她(丁洁琼)学了丰富的知识,她多么希望满载而归、投入祖国的怀抱啊!可是,当今的祖国,蒋介石专横跋扈,扼杀科学,窒息民主,只顾一味挥霍享受,不管国家的生死存亡……她回国后能有用武之地、如愿以偿吗?她迟疑了,……然而,怕什么?回到祖国总是闲不住的,我可以给丈夫搞搞些翻译,查阅资料,也可以登上讲坛,向大学生、研究生讲述高深的量子统计学和裂变反应——讲这些干什么?又制造原子弹吗?不!人类的第一批也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批原子弹,已经在爆炸的同时消灭了自己。今后不应再用科学制造武器,而是用它造福人类,因为原子能可以用来治病、发电、筑坝……还可以作为火箭动力,开辟太空航道。^{[4]248}

可见,丁洁琼还有热爱和平、尊重生命的善良品质。她率先认识到了核武器反人道的一面:

这位接触的女科学家痛斥了戈勒之流御用学者疯狂的核战争叫嚣,指出将来一定是进步的人类彻底消灭核武器,而绝对不会是核战贩们毁灭人类社会。她严厉谴责对广岛、长崎惨无人道的轰炸,反对美国政府推行核垄断的罪恶企图,反对继续研制和使用原子弹,反对利用核聚合反应来制造毁灭力更大的热核武器,反对迫害原子能工作者。^{[4]252}

无独有偶,叶玉菡也具有这种品格。解放前,她参加了一项“与罪恶的细菌武器之间”有关的研究,参与这项研究的部门居然有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陆军部、国会拨款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纽约战略生物研究所、驻华大使馆,还有梵蒂冈教廷。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他们使用无辜的中国小女孩做人体试验。

核技术在美国被制造成了危害人类的武器,而在中国则是自我证明的动力;外国势力“仅仅看到”病毒的杀伤性功用并用以制造细菌武器,而中国人会将其用于疾病治疗。似乎中国人的科技伦理总是高外国人一头。这样的情节设置,是为了突出中国人善良的品格和高尚道德,形成“道德优越感”。这种自我构造的道德崇高感在科技落后的现实中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并隐约透露出本民族优于他族的潜意识。小说用道德自任式的书写,论证了中国人发展科技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成了本民族的存在价值与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事实上,《第二次握手》透出的“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这两种叙述逻辑有着双重的联系。一方面,两者是一种“同构”的关系。“革命至上”隐

含自觉的、革命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赋予“革命”绝对的正义性。而“民族本位”则是民族主义心态的一种反映,却又有着寻求超越的紧迫感与落后先进的自卑感。必须看到,两者的同构性又都以二元对立为基础。“革命至上”需要以革命对象作为对立面,以反衬其意义与价值。正如小说选择了“旧社会”并极力突出其负面性以保证革命本身的正义性不被消解。“民族本位”则构建于“本族”与“他族”对比格局中。在“本族”在经济、科技落后于“他族”的情况下,小说依靠设定的“本族”智慧与道德优越感实现了自我证明,而又以“他族”科技的非道德行为完成了“本族”道德优越性的建构。由此,小说寻找到了—种落后者的心理平衡。

另一方面,“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又是一种“互构”的关系。“科学”是两者的交集。革命需要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来证明自身的正义性。民族需要革命和科学来实现振兴,同时还需要科学证明本民族的智慧与生存能力。科学的发展需要革命和民族的参与。在“革命”与“民族”的支撑下,科学的正义性有了明确的指向:只有合乎革命利益与“本民族”利益的“科学”才是正义的。比如,苏凤麟一度被塑造成为“旧社会”的代表,但他死后,小说并没有给予太坏的评价。这是因为苏凤麟的认同中华民族“向心力”,这类似于韦弥与孟文起(宗璞《我是谁?》)争取获得“做‘人民’的资格”,^[6]都是借助所谓的“认同”完成了对“革命”的皈依。从这一意义来说,“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恰是在这种“同构”与“互构”双重关系中完成了“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参考文献:

- [1] 王 尧.《第二次握手》“手抄本”与“定稿本”[J]. 小说评论,2011(1):33-38.
- [2] 张 扬. 第二次握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3] 董 健,丁 帆,王彬彬.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1.
- [4] 张 扬. 第二次握手[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 [5] 邓谦林.《第二次握手》的历史书写方式[J]. 小说评论,2012(5):84-92.
- [6] 陈进武. 反思文学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读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3(2):89-92.

责任编辑:黄声波